

# 古泽尔·雅辛娜《我的孩子们》:

# 个人童话和历史童话的生与灭

□胡颖

2015年,名不见经传的俄罗斯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凭借其长篇小说《祖母伊哈睁开了眼睛》一举斩获了俄罗斯国家文学奖“大书奖”和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奖等重大文学奖项,成为近年来名声大噪的文坛新秀。这部作品被评论家认为是近几十年来俄罗斯当代文坛最夺目的处女作,不仅在俄罗斯掀起了阅读浪潮,经译介后在我国也颇受欢迎和好评。然而,《祖母伊哈睁开了眼睛》的成功也催生了更多期待和随之而来的担忧,令许多评论家和读者怀疑的是,雅辛娜处女作中所展露的文学天才是否只是昙花一现?因此,三年后雅辛娜推出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我的孩子们》引发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作也成就了这位新锐作家能否站稳脚跟的一块试金石。

雅辛娜再次证明了己。2019年,《我的孩子们》获得了“大书奖”评委会奖和读者选择奖的双重肯定,俄罗斯著名文学批评家帕辛斯基认为,她的第二部作品“无论在艺术价值还是主题清晰度上,或者从任何其他标准上而言都丝毫不逊于第一部小说”。值得中国读者庆幸的是,这部作品不仅很快地在2020年末于我国翻译出版,其刚刚获得“俄中文学外交流翻译奖”一等奖的中译本亦品质不俗,用充满诗性的文字将苏联德裔聚居地人民的命运沉浮和历史画卷忠实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我的孩子们》以德裔乡村教师雅各布·巴赫的跌宕命运为主线,展现了伏尔加河德裔聚居地人民的生活变迁,以及沙俄末期至苏维埃建设初期的历史进程。在伏尔加河左岸村庄任教的巴赫意外受邀前往右岸的格里姆庄园,为家教森严的庄园小姐克拉拉·格里姆教授德语课程,两人日渐互生情愫。克拉拉从举家移往德国的途中逃回家乡,遭受村民非议的两人回到格里姆庄园过起了离群索居但自食其力的田园生活。但好景不长,克拉拉被匪兵强暴后生下一女并不幸死去,巴赫也在愤怒和恐惧中永远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深爱妻子的巴赫独自抚养非亲生的女儿安娜,靠为集体农庄书记霍夫曼编写作为宣传手段的德裔民俗知识和民间童话换取粮食,后来收养了流浪儿瓦西卡,在风雨飘摇的二三十年代为孩子们艰难地撑起了保护伞。这部作品延续了雅辛娜前作的诸多特点,它们讲述的都是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且将历史框架基本锁定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此外,两部作品都具有家庭自传性质,祖列伊哈以雅辛娜的祖母为原型,而巴赫则以其祖父为原型。《我的孩子们》在艺术性上同样不逊于《祖母伊哈睁开了眼睛》,温柔的抒情性与冷峻的悲剧性交织相映,广博浩大的史诗性与奇诡惊险的故事性并存,尤为值得我们探讨的是,雅辛娜作品中特有的“童话感”在《我的孩子们》中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伏尔加河流域德裔人的生活是一段长期被遗忘、被忽视的历史,也是雅辛娜一直想要展现的历史图景,而童话就是她所找到的一把打开这段历史的钥匙,也是我们解读这部小说的关键核心。《我的孩子们》中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德国童话和民间故事,从保姆蒂尔达为克拉拉用朴实无华的方言讲述的恐怖传说,到巴赫打开克拉拉世界的德语童话诗,再到巴赫为霍夫曼整理编写的上百个一度变为现实的精妙童话,小说由一个个小童话镶嵌并串联了起来。与此同时,小说中还隐约可见许多充满魔幻色彩的童话形象和母题,有着少女面容却又天生畸形的驼背霍夫曼、掌握神秘咒语控制西瓜生长的西瓜女郎艾米等村民形象就如童话脱胎的童话人物,而小姐克拉拉和保姆蒂尔达不正是《囚徒姑娘》中那被残忍的父亲关在塔楼的那对主仆?巴赫科萨落鸭绒被中的羽毛,天空便下起了雪,不正是格林童话《霍勒太太》中的经典情节?除此之外,小说中巴赫撰写的一个个“成真的童话”本身亦可称作另一层面的童话故事。

小说中主要人物的命名同样体现了小说特有的童话性,雅辛娜运用了“会说话的人名”(говорящие фамилии и имена)这一特殊修辞,如巴赫的名字“雅各布”(Jacob)和克拉拉的姓氏“格里姆”(Grimm,多被译为“格林”,中译本根据俄文原著译为格里姆)取自举世闻名的德国童话作家格林兄弟(雅各布·格林与威廉·格林),他们将民间童话与传说整理成为至今为止最为畅销的童话集《格林童话》,一如收集编写德国民间童话的巴赫。“巴赫”之姓也同样有其寓意,雅辛娜曾在访谈中指出,为主人公赋予“巴赫”这一著名的德国姓氏,除了意在强调其民族血缘外,还暗藏文字上的玄机:“Bach”一词在德语中有“小溪、小河”之

意,意指汇入伏尔加、滋养伏尔加的众多溪流之一,正如小说的主人公巴赫一般,是伏尔加河的一部分。除了巴赫以外,小说中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童话撰写者——集体农庄书记霍夫曼,他一心希望把因循守旧的格纳丹塔村拖进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巴赫的童话是他寻到的思想武器和宣传手段,他总是会为巴赫那娓娓道来、抒情自由的童话加上农民无产阶级式的寓意性结尾。霍夫曼这一德国姓氏显然与德国著名作家E.T.A.霍夫曼存在渊源。E.T.A.霍夫曼是德国浪漫主义艺术童话的代表作家之一,其童话中光怪陆离的幻想元素常与平凡的日常生活有机融合,曾深刻影响了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19及20世纪俄国文坛巨匠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文所提到的,雅辛娜作品中牢牢依附于现实的神秘幻想正是以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艺术童话的典型特征。《我的孩子们》中巴赫的现实生活、虚幻梦境和无意识交织杂糅,其乖张诡异的行为(如巴赫对暴风雨那“瘾君子”般的热爱、痴痴守护冰封的妻子遗体)、虚实难辨的神秘体验(如克拉拉死后巴赫的灵魂抽离、巴赫落入伏尔加河见到了被历史和时代抛弃的人和物)所营造的阴郁而浪漫的气氛,都与E.T.A.霍夫曼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无怪乎雅辛娜肯定了己作为“幻想题材作家”的身份,并认为与自己的创作最为接近的俄国经典作家正是果戈理和布尔加科夫。

事实上,细读作品后我们不难发现,小说本身就具有独特的童话时空。“伏尔加河将世界一分为二。”作品开篇第一句就已暗示出两个时空体的存在。低矮平缓的左岸是草原和村庄,主人公原所在的格纳丹塔村(德语意为“富饶的河谷”)就坐落在此;层峦叠嶂的右岸则人迹罕至,峰岩陡峭,山寒水冷,分布着大片的森林和沼泽,巴赫前去教书而后居住一生的格里姆庄园就藏在这山峦和森林的背后,似乎全然脱离了历史和时空。如果说巴赫将包围于伏尔加河平原的格纳丹塔村视作“小宇宙的中心”的话,那么右岸的格里姆庄园则完全是宇宙之外的时空,它仿佛一个稳固不变的世界,屏蔽了一切外在历史的影响,左岸世界所经历的一切——战乱、饥荒、余粮征集制、农业集体化都在这一屏障之外,这里的时间是环形的,而非线性上的,只存在季节的循环更替,却从不真正向前推动。正如俄罗斯著名民俗学家梅列金斯基在其专著《神秘诗学》中指出的,神秘时空内充满了种种事件,但并不存在内在的延伸性,它是超越于时间流的“例外”,因此可以说,右岸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具有童话性质的神秘时空,相较于真实确切的历史时空而言,这一时空内的人更像是浩瀚宇宙和广袤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可以说,《我的孩子们》中不仅大大小小的童话星罗棋布,同时充满了形形色色的童话元素和童话母题,小说本身还可被视为一部庞大的艺术童话。如若把《我的孩子们》视作以巴赫为主人公的民间童话,那么它一定是《囚徒姑娘》这部童话的变体。小说前半段就是巴赫以自己与克拉拉为原型改写的《囚徒姑娘》,深受父亲控制的美丽公主爱上了贫穷偏僻的乡村教师,逃离幽禁后与老师一起劳作生活,种植苹果;经历悲剧转折的后半段同样可视为《囚徒姑娘》的续写,乡村教师独自抚养公主留下的孤女,躲开外界纷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以无言的爱滋养孤女和流浪儿,孩子们最终进入保育院接受教育,排演的戏剧正是巴赫当年撰写的童话《囚徒姑娘》,这部童话剧后来也被搬上了苏联的各大剧院舞台。

然而,《我的孩子们》绝非一部简单融合德国童话及其艺术风格的作品,也不仅仅是一部围绕小人物所撰写的个人童话,而是一部记录时代进程的历史童话。小说中的伏尔加河不仅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还是穿行流淌于主人公们之中的历史的象征。除了围绕



古泽尔·雅辛娜

巴赫进行的主线,小说中还有一条关于国家“领袖”的副线,作者虽从未点明“领袖”真身,但读者可以轻易辨认出“领袖”就是斯大林,这条埋藏在小说中的伏线主要分为四段:1924年斯大林秘密探访临终前的列宁时对苏联德裔自治制度的思考;1927年斯大林乘专列私访德裔共和国首府波克罗夫斯克;以台球为喻讲述1933年前后斯大林与希特勒就苏联德裔群体进行的数次政治斗争;1938年大清洗时期斯大林对叶若夫逮捕所谓“德国情报机关间谍”的肃反行动的思考。小说的主副线总是交汇于伏尔加河,它们都围绕着苏联德裔聚居地人民的历史命运进行,甚至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全体人民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正如小说标题所指的既是巴赫的两个孩子安娜和瓦西卡,也是叶卡捷琳娜大帝称作“我的孩子们”的德国移民,更是苏联的全体人民。

雅辛娜曾在访谈中谈到:“于我而言,《我的孩子们》首先来说并不是苏维埃初期那些德国童话的实现,而是几乎已经实现的苏联童话,曾经存在这样一个时期,几乎所有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人都相信,苏联童话是必将实现的。”事实上,童话不仅是《我的孩子们》极为重要的主题,更是小说的隐喻主体。小说中巴赫撰写的丰收童话奇迹般成真的1926年和1927年,不仅是苏联真实历史上罕见的大丰收年,也是举国上下的希望之年。农业风调雨顺,工业欣欣向荣,文学发展迅猛,电影艺术开始腾飞,一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回归,同样开始相信新未来的到来。雅辛娜指出:“也就是说,存在这样一段高涨的上升期,某个充满热情和信念的时代,人们相信苏联童话必会成真,并且很快就要实现。然而事实证明,不,它没有实现。对于我来说,小说中的童话和运用童话的用意即在于此。”

巴赫是联结伏尔加河左岸现实与右岸童话的人,也是联结人民与历史的载体。现实曾一度如此接近童话,但这个童话却迅速地破灭了,巴赫的个人童话如此,苏联二三十年代的民间童话亦如此。然而,雅辛娜似乎不愿也不忍让故事停留在童话幻灭的悲剧结局上,她在小说尾声留下了希望的火星——与城默无语的上一代截然不同的“孩子们”。由于对残酷和苦难时代的恐惧和躲避,曾经谈起诗歌滔滔不绝的巴赫变成了哑巴,曾经无忧无虑的人们变得“如鱼儿一般沉默,如耗子一般奔忙”,他们成了苏联“沉默的一代”,而安娜和瓦西卡这一代刚刚开始成长的孩子却天生充满了自由和无畏、信任与热情,他们似乎才真正具备构建一个新未来的能力。正因如此,历经磨难后终于摆脱恐惧的巴赫将右岸的庄园改装成了一座幼儿园,按照霍夫曼的共产遗嘱将其取名“第三国际”,以期“为孩子们”那与生俱来的美好品质提供更加安稳的庇护所,盼望“孩子们”在新的未来创造崭新的童话。这是《我的孩子们》尾声处的希冀和留白,尽管这个童话王国建成与否,历史已早有定夺。

巴林是一个群岛之国,位于海湾中部,北邻伊朗,东西分别与卡塔尔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相望,是沟通世界东西交通的要道,也是连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印度河流域的必经之地。因此,巴林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巴林风光旖旎,造船业与捕鱼业自古发达,素有“海湾明珠”“海湾绿洲”和“海湾新娘”的美称。

公元前3000年,阿拉伯半岛东部和巴林群岛成为狄勒蒙文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450年)的发祥地,因此,古代巴林也被称为“狄勒蒙”。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巴林岛就被称为“阿瓦勒”。“阿瓦勒”是当时一些部落崇拜的神,形似牛头,位于现今穆哈拉格岛上。直至16世纪前后的整个伊斯兰时期,现今的巴林岛均被以其旧名“阿瓦勒”指称,巴林人也自称是“阿瓦勒”阿拉伯人。近现代,巴林为摆脱外族统治和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二战后,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阿拉伯民族主义传到巴林,巴林要求独立的愿望日益强烈。1971年12月16日,英国殖民者的军队撤出巴林,巴林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2002年,巴林国名改为“巴林王国”。

巴林面积很小,但是作为诗歌的民族——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诗歌在巴林也体现了巴林文化的精髓,使巴林成为诗歌的王国。早在贾希利叶时期,著名的“悬诗”诗人之一塔拉法·本·阿卜杜就来自巴林的土地,为我们留下了著名长诗,开头是:

踏上赛赫麦迪的砾石地,  
寻觅心上人那某昔日的牧场和营地。  
遗址像刺在手背上的黥墨,  
点点划划,印迹依稀。  
一时间,情丝缕缕,  
缠绕着不尽的眷恋和忧郁。  
同伴勒马在身旁:  
“坚强些,莫愁断了漠漠悲肠。”

诗歌以其传统的风格在巴林继续着自己的存在,直到当代新诗歌运动在巴林出现。

大约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巴林的新诗歌运动以一种弱小的形式崭露头角。尽管开始之路充满困难和艰辛,但它终于克服了重重障碍,坚强地存在并发展着。

作为新诗歌运动的主体,许多年轻人积极地进行了诗歌创作的尝试。他们的尝试有着丰富的人文内容和良好的诗歌表现,其中一部分诗歌达到了相当优秀的创作水平。这个运动的苗头出现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后的60年代可谓是其深度酝酿和发酵时期,为其大步前进做着准备。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呈现了高潮,深受解放思想、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影响。阿尔及利亚进行了解放战争,亚丁和马格里布爆发了独立战争,埃及进行了反对殖民者的战争,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一切都使包括巴林在内的阿拉伯各国从落后的政治和社会的孤立中解放出来。

同样,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阿拉伯人在1968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的失败,引起了阿拉伯人更多的紧张、焦虑,使一些人感到灰心丧气,这种对阿拉伯人心灵的巨大打击,影响了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一残酷的打击,也使阿拉伯人从彷徨中清醒过来,并使思想解放、政治解放和社会改革的口号以及一切已经失去和丢失的意识重返心里。这种巨大的反叛和尖锐的矛盾,使20世纪60年代成为阿拉伯世界文化一个最精彩的时期,民族的、政治的,甚至感情方面的梦想直触云端。

就是在这个时期,巴林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有了许多重大发展,影响了包括诗歌在内的各个方面,使巴林的新诗歌运动获得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并在表现形式上获得了新的启迪。这一运动终于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具有了清晰的轮廓。

这一时期涌现出的最突出的诗人有:艾哈迈德·穆罕默德·阿勒哈利法、阿兹·阿卜杜·拉赫曼·盖绥比、阿卜杜·拉赫曼·穆罕默德·拉菲仪、阿里·阿卜杜拉·哈利法、加西姆·哈达德和阿拉维·哈希米等。

由于他们在诗歌领域的地位和思想能力的差异,这个运动中的诗人们在诗歌创作的精通、对诗歌创作的贡献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但是,由于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均怀着深厚的情感,致力于真诚有益的实践,因此,总体来说,他们的作品都具有优秀诗歌的艺术要素。

他们诗歌的一个最主要特点是,内容多围绕者客居异乡、焦虑、彷徨、希冀、希望遗失和愿望死亡,其原因是,他们都饱受现实生活之苦的折磨,各种压力几乎让他们不能承受,因此,他们力求解脱,希求完美。其手段就是用强有力的、能够反映现实、对现实进行深刻解析的诗句进行表达。这使得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倾向:深深植于他们心中、并推动他们去触及朴素的、被压制的人们面对的问题和忧虑,进而呼吁解除他们的困难。方法就是真实地、自然地这一切进行表达。他们期望的是体面的生活、正确的价值观;他们追求的是一个充满正义,没有痛苦、恐惧和欺压的理想的人类社会。

对祖国的热爱、对人道主义原则的坚守,使他们能够体会他人的痛苦和困难。因此,他们有一种共同的集体感情,使他们的诗歌被悲伤的、动人的音韵笼罩。因此,可以说,他们的诗歌是社会诗篇,是人们心中的感觉和他们失去的希望的具体体现。他们的诗歌中都有着对读者的强烈呼唤,让读者剖析自己的内心,承认内心潜在的力量,从而努力去改变社会、政治和思想中的现存模式,重新去审视那些阻碍人们前进的僵化的价值和风俗习惯。但是,他们诗歌的另一方面则是内心的悲伤,感觉到梦想和希望难以实现。因此,他们大量使用了象征性的词语和手法,表达他们的情感、思想与内心的独白。

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受到当今时代优秀的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驱使他们在诗歌中更多谈到的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使他们的诗歌充满时代气息,可以说,他们是用自己的诗歌参与了自己国家里各种人类问题的解决。在现代新诗歌运动中,许多从前沉浸在自我感情里的诗人开始减少对他们个人世界的讲述,表现出了明显的走向世界的趋向,他们展望未来,同时,开始做好准备,迎接未来。这种趋向使我们看到,代表这个运动的诗人们的作品的内容以极强之势集中在社会方面,同时,也保留了巴林诗歌原有的自我之声:强烈的抒情诗、哲理诗,描写大自然,表达思乡和思念祖国之情。

在格律方面,新诗歌运动的诗人们有相当一部分推崇并使用了自由韵律,统一的或各种不同的音步。同时,还有另外一些诗人仍然坚持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稳重的韵律和明显的音乐感。

巴林新诗歌运动中的诗人们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梯队,彼此之间有所交叉,但是不能将他们说成是三代人。

第一梯队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的诗人,绝大部分参与了1969年末的巴林的“作家与文学家之家”的建立。主要有:阿里·阿卜杜拉·哈利法、加西姆·哈达德、阿拉维·哈希米、尤素福·哈桑、哈玛黛·赫米斯、伊曼·艾斯丽等。

第二梯队主要是那些在新文学的气氛下,特别是在“作家与文学家之家”的范围之内,取得了诗歌创作成就的诗人,他们多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主要有:叶阿古布·穆哈拉吉、阿里·舍尔高维、阿卜杜·哈米德·高伊德、赛义德·欧维纳提和阿拉维·高伊德等。

第三梯队主要是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并在80年代以后,发表了他们的第一部诗集。如:法齐娅·桑迪、艾哈迈德·穆顿、法塔希叶·阿吉兰、艾哈迈德·阿吉米等。当然,还有一些诗人,虽然尚未有诗集发表,但却有零散的诗篇问世,如:萨勒曼·哈依吉、贾法尔·哈桑、尤素福·哈希米等,他们也属于这一梯队。

近年来,在巴林出现了许多年轻诗人的声音,特别是由于“作家与文学家之家”对年轻人的重视,积极鼓励他们在巴林的报刊上发表他们的诗歌作品。如:法特梅·合吞、乃比莱·祖巴丽、穆罕默德·班吉、海勒迪叶·莱伊拉·赛德、艾哈迈德·赛特拉维、阿里·基拉维、白沙尔·阿里、阿卜杜拉·古尔姆孜、穆罕默德·乃加尔和穆罕默德·贾法尔·纳伊姆等,他们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梯队的代表人物。

# 诗与群岛之国

《巴林诗选》译者序 □王复

## ■书讯 《养蜂人之死》出版

《养蜂人之死》是瑞典作家拉斯·古斯塔夫松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古斯塔夫松坦言:“这是一部有关痛苦的书,它描绘了由疼痛统治的、通往终点的旅程——疼痛之下,别无其他。”冬日的冰雪开始消融时,由小学教师转行而来的养蜂人拉斯·莱纳特·维斯汀怀疑自己罹患癌症,时日无多。他将未开封的诊断通知扔进壁炉,拒绝在医院度过余下的时光,而选择隐居乡间,独自开始“自救之旅”。他回忆起亦真亦幻的过往,疾病令感受越发敏锐……小说主体由主人公留下的三本笔记构成,翻开它们,维斯汀最后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徐徐展开。通过敏锐而不失幽默的哲思,平凡人面对生之痛苦的倔强、勇敢得以呈现。(宋 闻)



俄罗斯画家希施金作品

世界文坛  
SHIJI WENYUAN

